

本
期
导
读
B18 聪明人不恋战
B19 年宵花瓜叶菊

家庭周刊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497 期 | 2014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五 责编:吴南瑶 视觉:叶 聆

B20 屠喧 温暖老人“小太阳”



“母亲专业户”:人生总有缺憾

◆ 王宇萌



小小离家开始演艺生涯

宋春丽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工人家庭,上中学的那年,身材高挑的她被选为班里的体育委员。有一天,学校来了位陌生的女老师,宋春丽和女伙伴们被叫到操场上练习形体,练到最后只剩下宋春丽和另外一个女孩子了。女老师对她们说明来意:她是广州军区歌舞团来招生的辅导老师郭华平,你们被录取了。

能到歌舞团简直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,而命运之神竟这么突然地来到她的身边。广州在哪里?没出过远门的父亲打听了一下,得知那个地方在千里之外;那个地方离香港很近;那个地方曾有美蒋特务出没。父亲犹豫了,街坊邻居也来劝:“宋大爷,您别呀,别把这么小的闺女送那么老远,多危险啊!”父亲满腹狐疑,他知道旧社会有人冒充军队招兵拐卖人口的事。13岁的宋春丽一听说父亲不让她去,像病了一样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。母亲倒是开通,说:“树挪死人挪活,与其在家里受穷不如出去闯荡。”

父亲送女儿到火车站。站台上人山人海,都是解放军。当时参加全军文艺汇演的大部队正往广州集结,士兵们正在集合,女兵们穿着短裙皮靴,戴圆帽系皮带,英姿飒爽的;领导都戴着大盖帽……父亲一看到那威风的阵势,忐忑的心里算是踏实了。他对接宋春丽的一位团长说:“不是人贩子,是队伍。”

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讲,13岁去当兵的确是件不可想象的苦事情。但对于那时的宋春丽来讲,简直就是去享福。3年苦难时期,正在长身体的宋春丽根本吃不饱肚子,一家4口靠父亲的37块钱过活,还要交兄妹俩的学费。到了部队就能随便吃,宋春丽说她那时一顿能吃6个包子。从她走后,家里因为省了一个人的饭,捉襟见肘的拮据日子逐渐得到缓解。

参军7天后,宋春丽就开始了野营拉练。一个13岁的小女孩,背着背包,一天要跑百里路。宋春丽把广州当成了她的第二故乡,她在部队里住上了楼房,吃饱了肚子,干上了自己喜欢的文艺工作。苦孩子出身的宋春丽惦记着家里,到了部队两个月,她攒了10块钱寄回家,妈妈高兴地举着汇款单让全院的人知道她的女儿寄钱回来了。女儿在家书里描绘着自己崭新的生活,母亲欣慰地说:“春丽算是掉进蜜罐里了。”

1969年,宋春丽凭借着她的表演天赋被话剧团的领导选中,开始了她10年的话剧表演生涯。团里的剧目一个接一个,宋春丽的吃苦精神被同事们比喻为“铁打的”。随着中国的电影业开始复苏,各个电影厂开始去各地的文艺团体挑演员。这时,宋春丽遇到了困惑,她说:“那时我虽然也演了一些话剧角色,但在表演上很不自信,觉得自己没有其他演员长得漂亮,那时我有一个外号叫‘黑妮儿’,一到有电影厂来挑选演员我就躲屋里。”

单位领导也觉得宋春丽在表演上前途不大,于是让她从演员队出来,去担任形体老师,宋春丽心里并不甘心。后来,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,长影厂一个副导演到广州挑选演员,他是宋春丽的一个邻居的熟人,说有一个护士角色,问宋春丽想试试吗?在长影厂《苦难的心》中,宋春丽的这个小护士演得很自然,之后,八一厂的《奸细》剧组去选演员,宋春丽又被导演选中。随着这几部电影的演出,宋春丽被顺利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,开始了她之后几十年精彩的演艺生涯。



没有孩子成为永远遗憾

“不能不承认这是缘分。”宋春丽与丈夫孙维熙的家庭生活和谐稳定,两人当初是在朋友的介绍下相识相恋并结婚的,但经人介绍的婚姻未必就不幸福。

宋春丽把和爱人孙维熙的鸿雁传书比做“网恋”。他们书信来往了很久都没见过一面。半年后,宋春丽给孙维熙寄了快信,说了回北京探亲的消息,但孙维熙却没能及时收到,但神奇的是,当宋春丽戴着口罩怯生生地在音乐学院的门口探询时,孙维熙正好骑车经过,而且一眼认出了不曾谋面的恋人。

他们是在广州结婚的。之后宋春丽就把爱人筒子楼里那15平方米的斗室当成了他们的家。也许是因为都是搞艺术的,再加上他们的艺术追求和感悟比较一致,他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——不喜欢张扬,做人追求朴实大方。这些维系了他们婚姻生活的美满。宋春丽的脾气不好,在外边不敢发火回家就冲爱人发。爱人老让着她,这让她的内心充满了感激。宋春丽说,两口子没有不吵架的,但相互间的宽容理解和责任是弥足珍贵的。这也是他们相融、和谐幸福的源泉。

婚后宋春丽依然在广州,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的孙维熙在北京,两人不得不过起了“牛郎织女”般的生活。1980年,他们团聚的机会来了。宋春丽被邀请主演电影《奸细》。这部电影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,如果能很好地完成这次拍摄任务,宋春丽很有可能被调到北京。前往黑龙江之前,丈夫心疼地对宋春丽说:“到了那边一定要注意身体!”宋春丽高兴地说:“演好这部戏,我们就有望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了。”

然而,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已经29岁的宋春丽刚到外景地就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她惊喜交加,可一想到眼前的拍摄任务,很快又转喜为忧。《奸细》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,不仅拍摄环境极其艰苦,宋春丽在片中还有大量打斗的戏。如果继续拍下去,宋春丽也许就很难再保留腹中的孩子。由于这件事情牵涉整个剧组,她毅然说服爱人做出了非常痛苦的选择——回北京打掉孩子。为了不影响拍摄的进度,宋春丽休息不到一周就赶回东北继续拍摄。此后宋春丽迎来事业上的一个又一个高峰,几乎拿遍国内各种奖项,成为荧屏上的“第一母亲”。然而,岁月也无情地割断了宋春丽为人母的希望和幸福。

孙维熙不仅仅是宋春丽的爱人、朋友、兄长、好参谋,还是严格的师长。当宋春丽被包围在鲜花掌声中,丈夫会及时地提醒妻子保持清醒的头脑;当她遇到困境,丈夫默默支持她坚强面对;《九香》拿完奖正红火的时候,丈夫提醒她回避喧嚣的媒体;《江姐》这个角色让她举棋不定的时候,丈夫说,江姐这个人物值得一试……孙维熙是山东人,不会那些花言巧语阿谀奉承,宋春丽很难从他嘴里听到赞美。就像妻子对待她的表演事业那样,孙维熙最专注的是他的教学事业。他们很像舒婷诗中的那两株木棉,彼此坚守着自己的位置,平等诚挚地互相致意。

从来没有做过母亲,又怎么会在荧屏上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母亲形象。宋春丽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我没有做过母亲,但我做过女儿。我塑造的所有母亲形象中,全有我母亲的影子。”可以说对母亲的模仿和早年贫苦生活的锻炼,是宋春丽塑造母亲形象的两样法宝。

宋春丽两岁多时母亲李珍得了脊椎结核,必须将下半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接受治疗,整个人被困在病床上,连身都不能翻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宋春丽3岁那年,母亲就在病床上教5岁的哥哥做饭。两年之后,7岁的哥哥上小学了,已经5岁的宋春丽接替哥哥,也学会了站到小板凳上做饭。母亲告诉她米缸在哪儿,锅在哪儿,水缸在哪儿,让她把铝锅拿到病床上,母亲淘好米兑好水,再让女儿端到火炉上……母亲又教她和面,舀几勺金黄的棒子面,放到泥烧的绿瓦盆里,再添两勺水……母亲再教她蒸窝头,贴饼子,像一位老师,又像一位导演,人生的第一出戏就这样开始了。

1995年初春,宋春丽来到东北一个小山村,参加电影《九香》的摄制。其中有一场“贴饼子”的戏,导演让道具师把玉米面拿来先教教她,她说不用了,点火烧锅实拍吧。大家将信将疑地看着她。一会锅开了,只见她三刀两刀切好白菜推下锅中,又抓把大盐撒进去,然后倒水和面,一手一个饼子地贴在锅边,再伸手拽过木锅盖盖上,利利索索,一气呵成。很多人看愣了,问她是跟谁学的,她的回答更让他们大吃一惊:“这活儿我5岁就会干。”

离家16年的宋春丽一直盼望有一天回到父母身边,1980年调回北京后,忙乱之中的她总以为空闲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好好孝敬父母了,但是,她一部戏接着一部戏。第二年在戈壁滩拍《姐姐》的时候,在北京的父亲悄悄地离开了人世。家里人怕影响她的工作,没有告诉她父亲去世的消息,她是在拍完影片回到北京后才知道噩耗的。宋春丽接受不了,她还没来得及守在父亲身边行孝心,死神就彻底剥夺了她的机会。面对父亲的骨灰和遗像时,宋春丽才意识到父亲永远离她而去了,她责怪母亲和爱人为什么当时不把消息告诉她,甚至听不得侄子喊“爸爸”的声音,她永远忘不了小时候离开北京时,父亲跟着火车小跑着的踉踉跄跄的身影……

那些日子,悲痛之中的宋春丽接拍的片子也充满了悲剧色彩,她为自己的角色很自然地找到了悲凉的情绪体验。但是,那部片子出来后并没什么反响,事业的不

顺和生活的烦恼与父亲的离世相比,都算不了什么了。她把哀思寄托在日记里:我想念父亲,想得很苦。他的音容笑貌总浮现在眼前……他单位的同事送他一颗糖,父亲舍不得吃,他拿回家一咬两半,给哥哥一块,给我一块……以后我要把对父亲欠下的感情债,还在母亲身上……和年轻的朋友聊起亲情,宋春丽会语重心长地说:“好好孝敬父母吧,不要总以为还有机会,也许会突然错过。”

宋春丽的角色多是正统严肃的形象,其实,步入中年以后的宋春丽仍然没有改变她未泯的童心,她似乎永远都那么热情直率,看上去永远都像劳动妇女那么结实健康。宋春丽笑着抱怨:“其实我的身体并不是太好,现在也毕竟这个岁数了,得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。我可能是这样的人,病人膏肓的时候还在说笑话,没办法啦。”

